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06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 演进逻辑及其贡献

王力¹,刘晨华²

(1.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2.宜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在大革命后期,面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公然背叛革命及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掌握枪杆子和用枪杆子保卫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率先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论断。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设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枪杆子;政权;武装斗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050-07

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由于反动政权一般是掌握着强大武装的暴力机构,所以,面对武装的反革命政权,革命阶级为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采取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一——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一——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武装斗争。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驱除张敬尧、实施湖南自治失败后,初步认识到“政治界暮气已(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②,决定寻找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表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③。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将其不断完善。

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武装斗争思想的初步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④的目标,但当时党并未将此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从1921年诞生到1924年国共合作前这一时期,党主要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人运动,还不懂得组织军队开展武装斗争

收稿日期:2025-06-26

作者简介:王力(1967—),男,河北行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2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1921年7月—1921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初步认识到开展革命运动、建立新政权的重要性,但还未付诸实践。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占领的湖南、江西、湖北等地,中共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运动日趋高涨,有的地方自发起来争取城市和乡村的政权。在看到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高涨态势后,斯大林基于俄国革命经验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勇于进行争夺政权的尝试。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①,军队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要求中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通过军队去影响和推动农民参加革命、反对地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更加激进地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争夺革命领导权。随着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武装问题已经成为党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党在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也掌握着一部分正规部队和工农群众武装,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并没有重视这部分自己的武装力量。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曾指示中共要组织七万人的军队,其中应包括两万共产党员。事实上,当时中共掌握的军事力量以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力量,“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②,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和机会建立军队,应对可能扩大的反共形势。直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时,由于没有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的保障,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在敌人强大的武装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这一惨痛的失败教训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在湖南农村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调查与实践,深化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逐渐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思想,并认识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③。在大革命后期,面对一系列反革命事变的发生,尤其是马日事变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更加深刻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果断提出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由于马日事变导致湖南党组织瘫痪,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接见湖南工农干部时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④。随后,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进行党的组织恢复工作。在湖南期间,毛泽东在了解湖南的工农革命情况之后,针对马日事变后的严峻革命形势,他提出要用武力来应对。毛泽东认为,马日事变不仅是上海事件的继续,而且类似的反革命事变将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此,革命只有用武力来应对反革命的武装叛变,他要求湖南各县要迅速集中工农武装力量,“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⑤。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就农协策略问题指出要保存武装力量,“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⑥,并提出上山保存军事力量的策略。1927年7月上旬,毛泽东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时,就已经意识到武汉十分危急的形势,提出要做好军事应对的准备。为此,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⑦面对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掌握枪杆子和用枪杆子保卫革命的重要性认识。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论断。毛泽东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首先,要重视“军事运动”,即要抓枪杆子,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他指出,之前党中央对军事运动的不重视而专注做民众运动,还批评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也正是由于党不重视军事运动而导致大革命失败。其次,蒋介石、唐生智都是靠拿枪杆子起家的,也就是说,反革命是掌握了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最后,他直言我们现在虽然开始注意军事问题的重要性,但还不够重视和坚决,并以湖南的事件为例证,指出要非常重视军事问题,尤其是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

毛泽东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对历史经验和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而且也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面对惨痛教训,毛泽东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并能根据国情指明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式和方向。这也是他走向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开端。八七会议结束之后,针对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问题,毛泽东向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明确表达自己愿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斗争的意愿。这说明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而且重视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

二、“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此时,毛泽东发现了蕴藏在局部地区的革命力量。1927年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针对当时大部分人比较重视广东而不重视湖南工农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提醒大家要重视湖南。在毛泽东看来,湖南的民众组织和革命基础比广东更好,问题在于缺乏有力的组织者。他说:“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①会后,毛泽东从武汉回到湖南长沙。在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如何组织秋收暴动时,他明确指出秋收暴动不能只依靠农民力量,而要依靠军事力量夺取政权。他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针对以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当共产国际派来中国驻在长沙的代表马也尔提出要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对此十分同意。1927年8月20日,他在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③。在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正是共产国际代表传达的这个新训令,改变了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他认为,在进行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时候,要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子。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国民党的旗子已变成了蒋介石等新军阀的旗子而不是人民的旗子,所以革命只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才能代表人民并区别于新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④然而,当时党中央明确地批评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做法,认为毛泽东抛弃湘南暴动计划是错误的,并指责毛泽东“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⑤的正确主张。当时中央的意见是以依靠群众力量开展农民暴动为主,而将军事力量作为配合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⑥。对此,后来毛泽东指出,“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⑦。

1927年9月19日,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之后,在浏阳文家市召开的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的秋收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从城市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革命武装力量弱小的现实出发,提出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

应该放弃攻打长沙的做法,而主张把部队引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深刻认识,毛泽东才特别强调必须保存好这支刚刚组建的革命力量,主张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去寻找立足之地,再图谋发展壮大。

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艰难探索。首先是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以及军队的任务和打仗的目的问题。在率领部队向永新三湾方向前进的途中,毛泽东发现部队存在纪律松散、旧军队习气重等严重问题。1927年9月29日,他在三湾村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确立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等有力措施,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向部队作动员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时,要求部队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和严明部队纪律。为此,他宣布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①1927年12月下旬,他宣布部队三项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1928年1月25日,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为强化部队纪律教育,毛泽东给部队规定“六项注意”,即“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②。4月,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即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并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这一规定。5月4日,毛泽东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宣布部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理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遵循。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继续为人民解放军建设发挥作用。

在进入井冈山之后,毛泽东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确立了新型军队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新型政权的原則。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取得农民的认可和支持,必须为农民谋利益。毛泽东在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到湖南省酃县进行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解决部队经济给养问题的同时,听取当地党组织代表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要求他们大力发动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反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27年10月中旬,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占领城市这条道路行不通,更加坚定了在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更加意识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武装斗争必须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强调要重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11月中旬,毛泽东要求部队攻克茶陵县城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要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与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在建立各级政权的实践中,毛泽东政权建设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1928年1月24日,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号召人民群众要团结起来,要自己拿起枪来,和工农革命军一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同时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政纲共三十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内容。这一政纲既是对茶陵、遂川建设工农兵政权经验的初步总结,也表明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在枪杆子上怎样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认识。1928年2月,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说:“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了旧政府,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①1928年5月,毛泽东指导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并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为农民夺取土地使用权利,巩固苏维埃政权。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并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具有革命规律性的思想具体化,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毛泽东重点分析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并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②,阐述了枪杆子与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密切关系,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1930年1月初,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重点阐述了建立、巩固和发展政权对于推进全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随后在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方针和策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体系。

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到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重要论断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至此,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不仅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

三、“全民族抗日”和“人民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935年12月,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集全民族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当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国民党政府本应全力应对外敌入侵,但蒋介石却坚持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毛泽东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提出全民族抗战的主张。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的军事力量强,所以毛泽东提出必须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③。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要全民族抗日必须改革政治机构,实现民主,“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⑤。在作出中日战争的残酷性、持久性判断的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革命情势的游击战争的理论,通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谋划长期抗战。

在思考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策略和战略的同时,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枪杆子上如何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思想。1938年8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精辟的语言提炼和概括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对此,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一,“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⑦。毛泽东指出,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正确的革命原理,但是具体运用于各国则需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基本条件和具体情况来执行这个原则。其二,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关键,并且军队是政权的主要成分。他说:“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应有强大的军队。”^①为了启发、说服和教育全党高度重视军事工作,推动全党在军事工作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毛泽东对中西方革命的异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透彻而精辟的解说,得出中国革命离开武装就无法成功的结论。其三,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只有掌握了武装力量,才能巩固和发展党,才能建立政权和建设政权,保障和维护民众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总结出来的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懂得的真理。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进攻,毛泽东更加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③。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决定一切的。没有武装斗争,中华民族就会亡国灭种。只有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才能有无产阶级的地位、人民的地位、共产党的地位。只有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④。因此,毛泽东结合党的历史指出:“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⑤

十四年抗战的艰难和军民付出的巨大生命代价,使毛泽东坚定人民力量在战争中的分量。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军事才能,把国共两党的斗争打成了人民战争。1946年11月,在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内战爆发之际,毛泽东提出了打一场“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把共产党与广大农民联系起来,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通过各种方式支援解放军,成为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力量。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948年初,在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时,毛泽东思考战争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民战争必然要建立独立富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至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确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目标得以实现。

四、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果断选择率领部队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实践上,针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果断选择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领导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自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及时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不断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创立了中国革命战争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1927年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毛泽东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建立了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④罗红杰:《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弘扬路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队,确立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新道路,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如1936年底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①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着眼于从无到有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着眼于推翻一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着眼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指导下锻炼出来的军事路线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第三,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先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形成革命力量,最后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才举行短时间的暴力革命。与俄国革命形势不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条件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照搬俄国革命模式开展革命不断受阻的同时,毛泽东基于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成功开辟了一条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式革命新道路。这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式,也为当时广大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The Evolution Logic and Contribu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olitical Power Grows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WANG Li¹ & LIU Chenhua²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33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facing the severe situation that the rightist forces of the Kuomintang openly betrayed the revolution and massacred the Communist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Mao Zedong deeply realized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and defending the revolution with guns. At the August 7th Conference, Mao Zedong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forward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that “political power is obtained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o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establishing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nd build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Mao Zedong founded the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eizing power by armed forc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broad national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Mao Zedong le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fight a real people's war.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is a creativ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combining Marxis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theory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has made great original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barrel of a gun; political power; armed struggl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